



国防大学 2 071 3178 0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22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统一战线胜利的一曲凯歌

——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的

产生和发展 穆 欣(1)

记陇右地区的解放 牙含章(35)

日本侵略者杀害抗日英雄赵一曼的经过

..... 大野泰治(55)

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

..... 张严佛(63)

孙殿英投敌经过 文 强(94)

石友三投敌反共及其下场 张西铎(140)

军统局“策反”汉奸周佛海的经过

..... 王安之(162)

汉奸周佛海勾结军统及其下场 徐肇明(170)

我在招商局的见闻 尤质君(183)

漫话末代招商局 宗 于(199)

统一战线胜利的一曲凯歌

——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第一纵队的产生和发展

穆 欣

编者按：本文原是作者所著一本书中的一章，着重记述一九三七年秋至一九三九年冬，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在党的北方局和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领导下，配合第一二九师创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坚持山西抗战的英雄事迹；以及一九三九年末至一九四〇年初，在山西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十二月事变”的战斗历程。作者曾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作过，在写作此文时，又访问了薄一波同志等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决死队的几位负责人。他们不但给予热情的指导，而且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在应本刊要求单独发表时，为使读者能够了解当时较多的斗争情况，作者又把牺盟会、决死队的产生，决死队其他几个纵队和整个山西新军各部队，这个时期在党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事迹，作了简要的补充。由于当时斗争十分复杂，一时难于作出全面反映，因此作者认为这仅是一个初稿，希望能得到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的批评指正。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山西抗日战场上出现了一支新

兴的抗日劲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向南狼狈溃退的时候,决死队跟八路军一起,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当时,进入太岳山脉北部(临汾到屯留的公路以北,同蒲路以东,白晋路以西,以沁县、沁源、安泽等县为中心的地区),开展这一地区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的,就是决死队第一纵队。

整个决死队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起来,在八路军带领战斗中逐渐发展,日益壮大起来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它和其他在党领导下成立的新兴人民武装,如工人自卫队、政治保卫队及各种名义的抗日游击队等,共同组成山西的新军。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一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的凯歌,提供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很有意义的丰富经验。

一、在抗战的炮火中诞生

在抗战开始前,山西就有一个广泛的规模较大的抗日民主群众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爆发的,也是党领导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山西跟全国一样,遭到了日寇侵略的威胁,受到巨大的震动和影响。此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山西广大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逐渐高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任务是要用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发动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抗日斗争。党的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广泛传播开来。一九三六年春,红军由陕北东渡进入山西,更在广大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把党的政策直接传播给山西和华北人民,震撼了阎锡山在

山西的统治，给了山西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以很大鼓舞。群众都感到有出路了，要跟共产党走，跟红军走。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在国民党地区广泛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红军东渡造成的巨大政治影响，形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勇猛冲击着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阎锡山感到如果再照旧对人民的救亡运动进行镇压，他的统治就难于继续下去了。

日本帝国主义节节进逼的侵略也危及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北，侵占冀东之后，一九三六年冬天又发动了向绥远东部百灵庙地区的侵略，这就直接威胁到了山西，阎锡山感到面临灭亡的危险，必须在两者中择取一个：或者降日，参予成立“华北五省自治联盟”，充当人人唾骂的汉奸卖国贼；或者抗战，借以保持长期搜刮积累起来的亿万财产，并骗取民族英雄的声誉。他这个军阀和别的军阀不同，刮的地皮大都办了实业，他的财产都在山西，如西北实业公司下属的三十五家工厂，及他出资修筑的同蒲铁路等等。这些必须保持的财产，既无法匿藏，也无法搬迁。而要保持这些东西，就须抵抗日本的侵略。

同时，蒋介石国民党也竭力向山西伸手，他们派特务，在山西搞活动。国民党，利用晋南、晋北的矛盾（阎锡山是晋北五台县人，他的左右亲信多半是五台及其附近各县的人。山西民间流传着“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挖”的歌谣。晋南相当一部分地主豪绅对他的这种统治是不满的），搞河东道（指以运城为中心的黄河以东的晋南地区）独立运动，搞阎锡山的鬼，挖他的墙脚；蒋介石又乘红军东渡的机会，让关麟征的五个师进驻晋南，赖着不走，直接威胁着阎锡山的统治，造成他的忧虑和恐惧。

这样，就有三种力量（共产党、国民党、日本）摆在山西地主资产阶级面前：我党在群众中有影响，人民要抗日；蒋介石国民党要挤掉阎锡山，要把山西变成自己的地盘；日本侵略者要进攻，要逼迫他当汉奸，投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抗战，他就只有濒于死

亡。如果要抗战,除了接受我党的统一战线外,别无他途。但要这样做,既怕在统战中消亡,又怕为蒋介石吃掉。怎样能应付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又怎样能避免被蒋介石吃掉?在抗战后又怎样能保住自己?这些问题,使他陷入深刻的矛盾中。因此,当时的形势给阎锡山为首的山西统治集团出了一个题目:政治上怎么办,走那条路?

阎锡山根据其极端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在存在中求生存”,“一切为了存在”,为了要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终于找到一个合乎他自己逻辑的出路:就是必须与这三种势力折冲尊俎,在他同日本侵略者、共产党、国民党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找到一条独特的路线。——“抗日和日”(在抗战中观察形势,随时准备降日)、“联共反共”(在接受我党统一战线政策,表示要和我党联合抗战外,又标榜他的独特性,随时准备反共)、“拥蒋拒蒋”(表面拥护,实际抗拒。因为蒋介石要消灭异己,占领他的地盘,他是反对蒋介石的;反共一条,又同蒋介石是一致的。蒋介石的东西,凡不合乎他心意的,他都不听;而且严加戒备,抗战期间从不到重庆去)。按照这条复杂的路线,从阎锡山的幻想出发,必须选择一批真能抗日,真能像共产党一样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又真能抵制蒋介石侵蚀的人;而同时又要牢牢地保持一批随时真能降日,真能反共的人。开始重点是在前者,而其长远打算则在后者。这样,根据他的“二的哲学”,在抗日过程中搞出了一整套两面派做法:以进步掩护反动,以假左粉饰真右,以革命维持其反革命。妄想以此维持其封建割据的统治。根据这样一条政治路线,他表示同意跟共产党合作,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了所谓“联共”、“抗日”的“新政策”,喊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口号。所有这些,虽然只是以“进步”维持退步,想以进步的口号争取群众,缓和人民的反对,利用抗日的进步青年继续维持其统治,以便在实际上制止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扩大,阻止人民群众的觉醒。但是这也造成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有利条件,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推动抗日斗争。

一九三六年九月，阎锡山派代表到北平，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工作，旋即由我党北方局派出薄一波同志等五人到太原，跟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薄一波等同志研究了山西形势后，得出可以同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结论。遂即与阎锡山进行了谈判，商定他们可以留在山西，帮助山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当时薄一波等同志提出要：允许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允许在新组织的抗日团体中任用共产党员；薄一波等同志在山西只做抗日救亡工作。阎锡山则提出，不得在他的政府和军队中组织发展共产党。从此，与山西统治集团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很明显，阎锡山知道这是一剂苦药，但这恰是由他自己制造，自愿吞下的。他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是因为阎锡山急于要拿出力量来实现他的路线。他常说：“了解了周围才能站在中间”；但他又十分清楚，没有力量是不可能站在中间的。他原来的力量正在土崩瓦解，而在山西人民群众心目中，他已破产，毫无号召力，因此才想出这个“用共产党来发展自己”的计策。他的如意算盘是：我虽然用的是共产党，但它是戴的山西帽子（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名义等），戴山西帽子发展起来的力量仍然是山西的。我党正是利用他的这一想法，适应他的做法，派人进去，把抗日革命工作搞起来，坚持党的原则和立场，利用合法地位，公开宣传党的主张，吸收大量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壮大革命力量，利用阎锡山的“进步”的表现，推动抗日斗争。

当时，在山西成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薄一波担任书记，它的成员开始五人，以后增至十六人^①），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配合山西省委（当时还是非法的、秘密的，仍旧处于地下状态），开展同山西统治集团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如前所述，

① 这个工作委员会的十六名成员是：薄一波、杨献珍、牛荫冠、周仲英、董天知、韩钧、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力雷、傅雨田、刘亚雄、谷景生。这个委员会只做公开工作，但并不是公开组织，同阎锡山的交涉谈判，是由薄一波同志用个人或牺盟会名义进行的。

阎锡山跟我们合作的动机是发展他的力量，而采取了这样一条他自认为很聪明的“策略”。我们也就乐于进入阎锡山所设置的“圈套”，利用这种山西形式来发展革命的力量。合作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策略是尽量利用发挥“他的”那一套，去充分发动组织群众抗日，尽可能多地吸收山西以至全国的抗日革命青年来参加工作，尽可能地组织军队抓枪杆子，也尽可能地（特别在开始时）按照“他的”做法，利用“他的”口号（如不在文字上完全雷同于我们党的口号）、组织形式（如不一定叫“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组织军队抗日，去反对蓝衣社。我们这样做，就真正取得合法的权力，放手做抗日革命的具体工作。并且在实践中摸出对付阎锡山的一套革命策略。这套策略就是：利用山西当局的困难，提出进步办法，使其不得不接受，把进步办法合法化，再用此种合法东西打击反动的东西，这就成了用“他的”东西打击反动分子。我们党的工作就这样开始发展起来了。这时候的情况是：双方有斗争，但是斗争非常微妙。两家有仇恨，表面和好。他表面好，实际上是利用我们，而我们也利用他。在这里我们要大胆，谨慎，搞不好我们就会“蚀本”，搞好就能把革命力量发展起来。阎锡山这个人不简单，善于玩弄权术，两面三刀，“狡兔三窟”，极端狡猾，是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我们要有十分灵活的策略才能应付当时的环境，才能在这场微妙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在这样同阎锡山结成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后，我们首先接过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组织是受我党影响，在山西进步青年推动下，经阎锡山同意于一九三六年“九·一八”五周年成立的。但未开展工作。我们接过后，表面上仍是一个“官办”形式的组织，戴的是山西的帽子，山西统治者同意它们公开合法活动；实际是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革命进步的群众组织，是最广泛的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这个组织为我党在山西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它不仅是一个发动与组织群众抗日救亡的领导机构，而且可以参加政

权，以至组织抗日自卫武装。牺盟会在山西普遍成立后，由于我党的正确领导，它很快就成为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力量。我们党充分利用了这个“官办”组织形式的有利方面，有计划地配备了党在山西各地的领导力量，聚集山西以至全国的抗日革命青年学生，培养训练了大批干部。一九三六年冬，创办了“山西军政训练班”、“山西民众干部训练团”、“山西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随后，向各县派出临时村政协助员和牺盟会特派员（大都为我党党员及拥护我党政治主张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派往各县的牺盟会特派员，就是该县牺盟会的领导人，他既有发动群众，发展牺盟会的权力；又有监督县长的权力。我们就利用了这些合法权力，深入各地，深入群众，使山西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打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和托派分子，使山西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继而又适应阎锡山提出的组训三十万国民兵的“计划”，于一九三七年初，先后成立了十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包括军政训练班、民训团），每团二千人，为组建国民兵培养干部。当时在阎锡山看来，以为这是为他壮大势力的最好办法，但实际上却是为建立山西新军准备了骨干。由于以上斗争的胜利，山西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并为我党在山西进一步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山西新军作了准备。

“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山西。北平、天津、南口等地相继失守，日本侵略军沿平绥路、同蒲路前进，直逼山西，阎锡山在晋北的抵抗连连败北。晋绥军连吃败仗，溃不成军，有的闻风而逃，丧失了战斗力，雁北及绥远大部地区迅速沦陷敌手，山西的抗战形势出现了危机和严重困难。正在这个时候，由红军主力改编成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三支战略部队，先后由陕西挺进山西前线抗日，并接连在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等地消灭了大量敌人，取得了空前的辉煌胜利，大大振奋了人心，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对于山西以至整个华北抗战形势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对山西人民来说，是很幸运的。山西统治集团在日本

帝国主义进攻面前，惊慌失措。他的旧军队一触即溃，他的旧政权的人员狼狈逃窜，感到无法收拾；同时又感到八路军的抗战声威大振，惧怕整个山西完全“赤化”。因此他就更企图利用牺盟会的力量来挽救危局，既可抵抗和延缓日寇进攻的速度，又能和八路军争夺一些群众。这时我党根据华北这种形势的变化，及将近一年来我党在山西开展工作已取得的成绩，认为我党（主要是通过牺盟会）的领导，应突破山西形式，独立自主地去干。假使前一阶段（一九三六年九月——一九三七年七月）体现在牺盟会工作上的党的策略是稳扎稳打，反对“左”倾空谈，认真结成统一战线，利用合法手段，站稳脚跟；那么，现在就要大刀阔斧，不受约束，反对右倾保守地去干。到农村去，放手发动群众，抓枪杆子。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工作方式的时刻，必须认真转变。根据党中央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的方针，我党在山西旧军不抵抗日寇进攻的情况下，抓住阎锡山急欲挽救其败局的愿望，通过牺盟会，适时提出正式组织新军的主张。阎锡山正惊慌未定，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在由他派遣旧军军事干部的条件下，开始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组成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第一总队成立不久就北上五台，进行活动，开展群众工作。约一个月后，薄一波同志返回太原，用第一总队的实际行动说明，组织新军是有前途的，说服阎锡山同意正式组成山西新军四个决死纵队，一个工人武装自卫队。——以原有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团加一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组成决死第一纵队，以其他几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分别组成决死第二、三、四纵队。每一纵队辖三个总队，每一总队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由山西军械库发给全副武器；各级军事人员由阎锡山委派（旧军官），政治工作人员由牺盟会委派（大都是我党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队员都是青年学生。工人武装自卫队（以后改称工卫旅）则是由太原兵工厂等厂和同蒲铁路工人组成的。当时党并秘密地派了少数红军老干部来决死队工作。决死队一成立就建立了政治工作和有特殊权力的政治委员制度（这个政

治委员的“特殊权力”很大,当时在决死队实际上实行的是“政委一长制”,政委可以撤同级司令员——那时都是旧军官——的职),为尔后与旧军官做斗争,直接掌握这个部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新军队伍到一九三九年时又发展了三个政治保卫队(简称政卫队),即二〇九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另外,还有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组织起来的十三个游击支队(以后合为暂编第一师)。到一九三九年的时候,新军已发展到约五十个团,合计占山西建制部队的三分之一,人枪则达二分之一。^①

山西新军决死队的成立,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山西的胜利,是在坚持党的原则和立场下,通过与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合作的形式,具体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的成功。这支新生的部队,尽管在形式上还是统一战线的武装,内部还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由于有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坚强有力的具体工作,便保证了这支部队将沿着党所指出的道路前进。

二、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娘子关、忻口相继失守后,日寇沿正太、同蒲两线继续进攻,太原危急,国民党军队及政府官员在一片混乱中纷纷南逃,山西旧军在溃败中已垮掉一半以上。山西统治阶级为了保住他在山西的地盘和旧军实力,不得不依靠牺盟会、决死队的力量,来抵抗日寇的进攻。于是重新划分行政区,委派牺盟会人员担任行政区主任,在他的总兵力一百五十个团的数额中,新军争得了三分之一的番号。在这些有利条件和时机下,山西党组织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展开了大搞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与发动农民群众的斗争。这个时候,不管政权、军队,只要能搞的我们就搞,能

^① 当时国民党共给阎锡山一百五十个团的番号,新军占了五十个,他给旧军留下一百个,但实际上旧军只有五六十个团。

搞多少就搞多少。全省各县绝大多数县长是我们的，除搞了五十个团的番号外，各县都搞了农会和农民武装自卫队。

太原失守前夕，由决死队第一、第二总队组成第一纵队，即分路南下进入沁县地区，以便开展太岳区的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同时组成的第二、三、四纵队及政卫旅、工卫旅等，分别在晋西、晋西南、晋西北地区开展工作。）

太岳地区的安泽、沁源、沁县等地，很早即有党的地方组织。这些地方组织在阎锡山的多次摧残下，曾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是保留下来的少数党员，却英勇地继续和敌人作斗争。他们保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和当地人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推动这一地区的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大批散兵游勇流窜各地，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同时蒋介石的第一、一七、九三、九八军，由正太线败退后盘踞于此。他们占据了很大的地区，结合国民党特务、地主封建势力，猖獗一时，阻碍进步力量发展，对工作妨害很大。决死队第一纵队进入太岳区后，针对当地情况，遵照党的方针，利用纵队政治委员薄一波兼任山西第三行政公署主任（即专员）的有利条件，放手开展工作。

这年八月，党中央举行了洛川会议。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规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反对蒋介石反动的两面政策的指针。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并在一切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前提之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并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这时决死第一纵队根据洛川会议精神，独立自主，大胆泼辣，放手发动群众。虽仍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山西形式，仍戴山西帽子，

但已突破山西形式，不受约束，反对右倾保守地去干。列宁说：政权是革命胜利的标志。根据大革命时代的经验教训，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而不因统一战线就放弃发动群众；山西第三行政公署成立以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第二道命令就是组织农会，放手发动群众。当时决死第一纵队的队员全是青年知识分子，就把部队分散出去，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组织农会、农民武装自卫队和牺盟会领导的游击队。将旧政权完全改组，建立新型的抗日民主政权。各抗日县政府成立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县长为主席、包括共产党和各进步党派、群众团体和中间分子代表组成的县政会议。同时把阎锡山经营的“主张公道团”合并进牺盟会，实际上取消了这个在红军东渡抗日时期由阎锡山成立的以反共为主旨的反动团体。决死第一纵队从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迅速安定了社会秩序，进一步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组织了大批游击队；还以部分兵力到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寇，锻炼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决死第一纵队开展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的时候，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已经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展开了创建整个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决死第一纵队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就是这个伟大斗争的组成部分。为了加强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晋冀豫省委组成后，在沁县成立了省委太岳工委（后改特委，安子文担任书记），负责领导同蒲路以东，襄垣、高平以西，曲（沃）高（平）公路以北地区的工作。各县都组织了县委。后在一二九师和太岳特委领导下，组成了太岳游击大队。一九三七年冬，由一二九师派出的八路军工作团一部到达沁县、沁源、屯留、安泽等地开展工作，使太岳区的各项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一九三八年三月，临汾失守后，决死第一纵队各部在同蒲线霍县、赵城以及其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给敌人很大打击。四月间在粉碎日寇对晋东南九路围攻作战中，第二总队尾击撤退之敌，曾在

一二九师主力带领下，收复沁县、长治。部队也得到扩大，新成立了军事指挥也完全为我党所掌握的第三总队，还组成游击第一、二团、保安第五团、第六团、政卫营及各县游击大队等部队。

决死第一纵队在进行上述斗争的同时，在内部展开了反对反动的旧军官的斗争。从决死队成立以后，阎锡山对这支武装力量的控制一刻也没有放松过，他派到决死队的反动旧军官始终没有停止过反共活动。我们的斗争方针就是具体运用前述的斗争策略，利用阎锡山说过的一些进步的、抗日的話，打击一切反动分子，把斗争合法化。开头，反动的旧军官的气焰很高，他们利用职权，强迫命令，压制民主，实行旧的军事管理训练，企图以此达到其统驭部队的目的。我们则以党员为核心，团结广大队员，孤立反动军官，提倡民主作风，利用阎锡山伪装进步的口号，在连队成立工作委员会、救亡室等群众组织，提出“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实行经济公开，要求军官减薪。反对打骂等军阀主义制度，反对贪污腐化，并运用政治委员的特殊权力和群众力量相结合，打击、限制反动军官的活动。规定凡是没有政治委员签署的命令，部队一律拒绝实行，连队士兵大会会有权对内部重大问题作出决定。抓住反动旧军官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违反军纪等弱点撤销其职务，逐步提升、任命由党秘密派来的红军干部担任团、营、连军事领导工作，巩固党的领导阵地。对旧军官中表现进步的进行争取、团结、改造的工作，信任他们，团结他们共同抗战、进步。同时积极动员农民参军，扩大部队。另一方面要求共产党员、政工干部积极工作，艰苦朴素，与群众打成一片，事事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提高了政治机关、政工干部的威信。这个时候，还在部队中秘密发展了党员。因此党对部队的领导日益加强，反动军官日益孤立。一九三八年六月，我一、二总队到同蒲线开展游击战争，纵队长鲁英麟和二总队长贾毓芝，利用纵队政治委员薄一波同志不在部队的机会，与旧军第六一军军长陈长捷相勾结，阴谋使新生的决死队去进攻临汾，去和有坚固设防工事之日寇硬拚，企图假日寇之手消灭决死队。当时决死第一纵队党

的组织识破其诡计，立即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各级政治干部领导下，发动群众的力量，集体向反动军官提出质问，拒绝执行没有政委签署的命令，反对打阵地战，要求将部队撤回沁源、沁县进行休整。反动军官鲁英麟、贾毓芝等见阴谋难逞，只身逃往晋西，部队随即返回根据地，进行政治整军。一九三八年夏、秋，先后召开了第一、第二两次干部会议，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开展民主、进步、革命的新作风。同时又撤销了一部分反动军官的职务，抽调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做军事工作，使我党在部队，特别是在基层组织中的力量更居于优势。党在实际上已掌握了这支武装，奠定了决死第一纵队和阎锡山斗争的胜利基础。

三、在反击敌顽夹攻中前进

太原失守前后(约从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到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全国处在抗日进步团结的气氛中，阎锡山在日寇猛烈进攻，国民党军队(包括晋绥军)溃退，而八路军却挺进敌后的扑朔迷离的情况下，头脑发昏，还未喘过气来，山西出现了所谓最进步团结的局面(是山西“进步”的顶峰)。山西当局以“存在就是一切”为前提，只有依靠、利用我党我军抵抗日寇的进攻，同时放手让牺盟会发动群众，组织新军，以壮声势，表现了愿意与我党(经过牺盟会、决死队)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当然，同时他也不忘记反共，暗中采取某些反动措施，限制进步力量的发展，例如他命令其各县县长阻挠我党我军发动群众和扩大武装。在此情况下，我们警惕地注视着阎锡山的动向，除对他的反动措施进行了必要斗争外，对他所提出的符合抗战利益的口号、纲领和政策，不论他们是否认真实行，我们都采取了给予支持的态度(所谓戴山西帽子)，利用这些口号，发展我们的力量。阎锡山在其失去自信，不得不依靠我党(通过牺盟会)发展力量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想保持他的“独立性”，一切都还想做出“山西牌”样子，用他的“山西牌语言”表现出来。我们不

去计较它涂漆过的招牌，只要这些口号是进步的，我们都拿过来，用作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抗日力量的合法口号。例如，我党提“减租减息”，他要在后面加一个“合理负担”；我们一般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偏要改为“有钱出钱，人家出力”；特别是我党一般总是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则大肆标榜“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好像这是他的，其实我党也这样提过）。扩而大之，无论学校、团体……他都冠以“民族革命”的招牌，这显示了阎锡山的阿Q精神。诸如此类，我们都采用了他的提法。同时，当他遭到日寇进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给予可能的援助。从而，当时在山西曾出现了团结抗战的好局面。面一般人对阎锡山的看法，也有了改变，好像他真进步了；而不知道阎锡山之所以如此表演的内情。这个局面，约坚持到一九三八年六月。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广州失守的时候，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后方，以致迫使敌人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将其主要兵力转向华北敌后战场，抗日战争遂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寇即加紧对我各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从而使敌后战场变为主要战场。这个时候，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已公开投降了日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亲美派，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盘踞在太岳区的蒋介石第三、九三、九八军等部，纠集当地反动势力，不断向我进攻、挑衅，制造摩擦事件。

山西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阎锡山，一生信奉“生存即真理，需要即合法”的唯我哲学，乃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典型反动统治者，被山西人民讥为“说甚不是甚，作甚不务甚”的背信弃义之徒。（阎锡山常常对他的部下说：“说甚是甚、作甚务甚”，而实际上完全相反）。根据这一套荒谬的哲学，他又常讲：“生存就是一切，抗战只是手段。”七七事变的时候，为了生存，他需要抗几天战。以后感到抗战是长期的，困难的，就想投降，这也是为了生存。正义公

理、国家民族观念，在他的字典里头是没有的。事实正是这样，太原失陷，阎锡山挨了闷棍之后，一时表现进步，但他逃到临汾后，就慢慢清醒起来了，便发出“不能抬上棺材抗战”的谬论。

一九三八年二月，阎锡山在临汾温泉召开的晋绥军高级干部会议上露了马脚，在一次机密会议上，他拿出徐永昌从武汉给他的电报，内容是德国大使陶德曼建议的和平条件^①，要大家发表意见。与会者面面相觑，默不作声。阎锡山说：“这些条件并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会亡国灭种。”薄一波同志当场站起来说：“敌寇侵华目的，是灭亡我们国家。我们起来抗战，是要求民族的生存。若要求得民族生存，国家独立，舍抗战外别无他途，和平妥协是死路一条，只有当亡国奴了。”当即庄严声明：牺盟会、决死队一定要抗战到底，一定要反对和平妥协到底。阎锡山沉默良久说：“看蒋先生吧，中日战争总有和平了结之一日，我们以后不应该说反对和平妥协。”这次会议不欢而散。阎锡山已逐步看到，利用新军和牺盟会来巩固与发展山西势力的企图难以实现。但是，这时阎锡山尚未喘过气来，处境危殆，困难重重，只能靠八路军和共产党，牺盟会和决死队支持山西的抗战局面，所以还不敢有如何的反动动作。

阎锡山的妥协投降论调谈过不止一次，均为牺盟会、决死队所揭穿所反对。但阎锡山的投降准备，始终未停止过。牺盟会、决死队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只有实行民主，发动群众。阎锡山反对实行民主，取消民选县长、区长、村长及各县民意机关。他说：“政权是个刀把子，拿到我们手里可以统治人，拿到民众手里就会危害我们，

^①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南京危急之际（南京于十三日失陷），德驻华大使陶德曼见蒋介石调停中日和议。陶德曼第一次调停的条件是：（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之不驻兵区域；（三）扩大淞沪停战协定非武装区，以国际警察代替中国保安队；（四）中日经济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绝反日运动。其第二次调停的条件是：（一）中国政府应该抛弃联共政策，及反日反满政策，并与日满共同反共；（二）在必要区域内设立非武装区，并成立特殊政权；（三）日满中缔结经济合作之协定；（四）中国对日本为必要之赔偿。当时蒋介石表示：德国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